

佛教图像卷下

韩从耀 主编

于向东 著



中華圖像文化史



中国摄影出版社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韩丛耀 主编

中华图像文化史

佛教图像卷 下

于向东 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图像文化史. 佛教图像卷. 下 / 韩丛耀主编 ;
于向东著. — 北京 : 中国摄影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179-0494-6

I. ①中… II. ①韩… ②于… III. ①图象—文化史
—研究—中国—古代②佛像—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 J5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6199 号

中国摄影出版社“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编委会

主 任: 赵迎新

副主任: 高 扬

委 员: 方 芳 李亚坤 苏振涛 赵迎新 高 扬 (按姓氏笔画)

中华图像文化史·佛教图像卷 下

主 编: 韩丛耀

作 者: 于向东

出 品 人: 赵迎新

责任编辑: 丁 雪

封面设计: 冯 卓

出 版: 中国摄影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城区东四十二条 48 号 邮编: 100007

发行部: 010-65136125 65280977

网址: www.cpph.com

邮箱: distribution@cpph.com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开

印 张: 26.25

字 数: 49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79-0494-6

定 价: 19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三编 隋唐五代时期的佛教图像	385
第十八章 佛教历史背景与佛教图像概况	387
第一节 隋唐五代佛教历史背景	388
一、隋唐五代政治文化	388
二、隋唐五代佛教	390
第二节 隋唐五代佛教图像	398
第十九章 佛教图像生产	407
第一节 供养人	408
第二节 制作者与生产机制	414
一、名家与工匠	414
二、画行与画院	416
第三节 敦煌画稿	422
一、敦煌画稿发现的意义	423
二、敦煌画稿与敦煌图像	426
三、有待分析的问题	428
第二十章 佛教图像构成	433
第一节 龙门石窟图像	434
第二节 敦煌石窟图像	446
一、隋代	446
二、初、盛唐时期	452

三、吐蕃统治时期	456
四、归义军时期	460
第三节 四川石窟图像	464
一、川北石窟	464
二、川中石窟	470
第二十一章 佛教图像传播	479
第一节 佛殿堂图像传播	480
一、莫高窟第45窟形制与图像	480
二、两种观瞻视角	482
三、莫高窟第45窟图像传播的意义	485
第二节 变相与变文讲唱	490
一、敦煌变文的讲唱仪轨	490
二、配合变文讲唱的变相	492
三、变相意义的传播	496
第二十二章 净土图像与信仰	501
第一节 弥勒净土与药师净土图像	502
一、弥勒净土图像与信仰	502
二、药师净土图像与信仰	506
第二节 西方净土图像的发展与演变	512
第三节 西方净土图像与信仰	522
第二十三章 密教图像与信仰	531
第一节 初唐时期龙门石窟的密教图像	534
第二节 法门寺地宫密教图像与晚唐密宗	538
第二十四章 观音菩萨图像与信仰	549
第一节 观音主尊身份的凸显：观音经变的演变	550

一、隋代观音经变	550
二、唐代观音经变的发展	552
三、新式观音经变的出现	554
第二节 主尊身份的强化：密教观音图像的兴盛	558
一、十一面观音图像	559
二、千手千眼观音图像	563
三、不空罽索观音与如意轮观音图像	571
第三节 观音信仰的兴盛：显、密观音图像的融合	578
一、显、密观音图像的相互借鉴与影响	578
二、显、密观音图像之间的组合	582
第二十五章 文殊、普贤菩萨图像与信仰	587
第一节 乘狮文殊与乘象普贤图像组合的形成	588
第二节 文殊、普贤菩萨图像的发展	594
第三节 新样文殊与五台山化现图	602
一、新样文殊	602
二、五台山化现图	606
第二十六章 佛教图像本土化	617
第一节 本土艺术形式的借用：屏风式图像	618
一、屏风式图像的起源	618
二、屏风式图像与变文	621
第二节 富有本土特色的行道僧图像	628
一、画史文献记载的行道僧图像	628
二、行道僧图像的起源	631
三、唐代行道僧图像	634
小 结	638

第四编 宋元明清时期的佛教图像	643
第二十七章 佛教历史背景与佛教图像概况	645
第一节 宋元明清时期佛教历史背景	646
一、宋、辽、金、西夏、大理国政治文化	646
二、元明清时期政治文化	648
三、宋、辽、金、西夏等佛教	649
四、元明清时期佛教	653
第二节 宋元明清时期佛教图像	656
一、北宋、南宋佛教图像	656
二、辽、金、西夏、大理国佛教图像	658
三、元明清佛教图像	662
四、西藏佛教图像	665
第二十八章 佛教图像生产	669
第一节 制作者	670
一、画师、镌作与塑匠	670
二、文人、禅僧画家	674
第二节 生产机制	682
第二十九章 佛教图像构成	687
第一节 佛教寺院图像	688
一、河北正定隆兴寺	688
二、山西平遥双林寺	689
三、北京法海寺	692
第二节 佛教石窟图像	696
一、榆林窟	696
二、子长钟山石窟	702
三、大足北山、宝顶山石刻	704
四、飞来峰石刻	712

第三十章 佛教图像传播	717
第一节 佛教寺院图像传播	718
第二节 密教坛场图像传播	720
第三十一章 罗汉图像与信仰	729
第一节 十六罗汉图像	730
一、文献记载的早期十六罗汉图像	731
二、十六罗汉图像的发展与演变	732
第二节 十八罗汉图像	736
一、有关十八罗汉的文献著录	737
二、十八罗汉图像“新样”的产生	739
三、图像对信仰的影响	743
第三节 五百罗汉图像	746
一、宋代五百罗汉图像	747
二、元明清时期五百罗汉图像	750
第三十二章 水陆图像与水陆法会	755
第一节 水陆法会与水陆仪轨	756
一、水陆法会的起源与发展	756
二、“南水陆”和“北水陆”的法会议轨	758
第二节 元明清水陆图像的发展与演变	766
一、元代水陆图像	767
二、明代水陆图像	770
三、清代水陆图像	776
小 结	780
参考文献	784
后 记	794

第三編
隋唐五代时期的佛教图像



第十八章

佛教历史背景 与佛教图像概况

隋唐时期，建立起大一统政权，结束中国自西晋以来长期的分裂格局，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艺术领域取得辉煌的成就。在此背景下，佛教及其图像在南北朝奠定的基础上，取得长足发展，步入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五代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相比而言，南方吴越王朝及西南蜀王朝等地较为安宁，佛教及其图像较为兴盛，对宋代产生比较直接的影响。

第一节 隋唐五代佛教历史背景

隋唐王朝继承南北朝政治文化的同时，在多个领域有所建树，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隋唐五代政治文化

公元581年，北周静帝禅让王位于杨坚。杨坚，即隋文帝，建立隋朝，定都大兴（今陕西西安）。589年，隋灭南朝的陈，统一全国。618年，隋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被杀，隋朝覆灭。隋朝时，确立三省六部制，有效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为了选拔优秀人才，弱化世族垄断权力，隋朝制定出比较完整的科举制度，与此同时，监察制度等也进一步完善。隋朝施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在减轻农民生产压力的同时，增加了国库财政收入。为了巩固政权统治及促进经济发展，隋王朝兴建了著名的隋唐大运河以及驰道。

隋文帝在北周长安城东南处重新规划建造一座新城——大兴城。该城东西距离9.7公里，南北距离8.6公里。宫城位于北面中央区域。整座都城以中心街道朱雀门街为中心，坊市呈东西对称布局。作为隋代佛寺代表的大兴善寺¹，位于朱雀门街东面，规模宏大，占有一坊之地；作为道教中心的玄都观，相对应地分布在该街道西面。此种建筑布局蕴含着隋王朝儒、释、道三教并重的文化政策，唐代以后基本继承此兼容并包的政策。隋代时，“东京”洛阳的兴建²，使得另一个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得以形成。隋代南、北画家汇聚新都，促进了南北方绘画艺术的交流融合，隋代绘画创作由此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

公元618年，李渊自立为帝，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由此开创唐王朝。627年，太宗李世民登基后，采取一系列有效政治经济文化措施，国力兴盛，威震四方，开启“贞观之治”。690年，唐高宗皇后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

1 该寺位于靖善坊，本名“遵善寺”，隋文帝取城名二字、坊名一字，称之为“大兴善寺”。

2 隋唐时期，洛阳地区曾有洛州、东京、东都、神都等称号，但是治所中心均为洛阳。

史称“武周”。705年，唐中宗复位，恢复大唐国号。712年，唐玄宗李隆基即位，此后数十年间，政治清明，经济发达，军事强盛，四夷宾服，迎来“开元盛世”局面。安史之乱后，国力逐渐衰败，内忧外患时有发生。907年，唐王朝为朱温所灭。

唐朝是中国古代国力最强盛的朝代之一。唐朝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包容性、开放性与国际化特点。治国思想，以儒学为先，道、释为辅，三教之间虽有冲突，但是相互融摄的趋势成为主流。老子被道教尊为教主。自高祖李渊起，唐朝帝室就以老子后裔身份自居，为了巩固皇权，积极扶植道教。佛教经过南北朝、隋代时期的持续发展，已经深入人心，进入唐代后，高僧辈出，宗派繁荣，发展成为规模及影响最大的宗教。与此同时，从西域波斯等地传来的祆教、摩尼教和景教（基督教支派之一）等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信众以来自西域的胡人居多，人数远不及佛、道二教。

唐朝政治制度在隋朝基础上逐渐发展完善。科举制度为国家政权吸纳大量文化精英人士，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府兵制，在保持军事实力的同时，节约了军费开支。大量人口迁徙到土地较为肥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长安城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人口约有百万之多，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商贾，其中常住的国外人口不低于5万。东都洛阳、扬州、广州也是十分繁荣的城市。唐代前期，陆上丝绸之路畅通，唐三彩、丝绸、铜器等工艺品大量输出，远至欧洲大陆。安史之乱后，此条交通路线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唐代海上丝路逐渐繁荣。唐王朝在广州设立市舶使，掌管对外贸易，开创了此后长达千年的市舶制度。在政策开放，经济发达以及交通便利的背景下，唐代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空前的频繁。

唐代绘画艺术取得重大的成就。人物画领域，先后出现阎立本、尉迟乙僧、吴道子、张萱、周昉等一批著名画家，他们的创作具有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山水画从早期人物画的背景中逐渐独立出来。以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为代表的山水画家，开创了金碧山水流派。与此同时，花鸟画在此期逐渐独立发展，薛稷、边鸾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唐代绘画名家几乎都参与了此期寺、观壁画的制作。

五代是指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依次更替的五个政权，即后梁（907—923）、后唐（923—936）、后晋（936—946）、后汉（947—950）与后周（951—960）。唐末至宋初期间，中原地区之外还出现了十个地方割据政权，分别是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其中前蜀、后蜀、南唐、吴越影响较大。

五代十国政权，可以视为唐朝藩镇割据和唐代后期政治的延续，在政治文化制度方面大多延续唐王朝。五代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天灾不断，经

济、文化等领域没有取得多大建树。在南方建立的诸国，相对比较安宁，当权者重视兴修水利、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也取得较大的成就。

隋唐五代时期的佛教，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发展的，佛教文化事业的进程与此期的政治文化有着比较紧密的关联。

二、隋唐五代佛教

隋王朝施行三教并重的文化政策。隋文帝本人崇信佛教³，在位期间（581—604）给予佛教积极的支持，使得佛教各项事业取得蓬勃的发展⁴。

北周武帝晚年施行的灭法运动，严重破坏了中原及长江上游地区的佛教文化事业。在杨坚的极力推动下，北周静帝于大象二年（580）下诏复兴佛、道二教。隋文帝即位之初，开始大力振兴佛教。据《隋书·经籍志》载：“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阳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其后，度僧、建寺、造像各项事业也陆续开展。

隋文帝，仿北齐的制度，设置佛教昭玄大统、昭玄统及外国僧主等僧官，以管理僧尼事务。开皇元年，文帝任僧猛法师为昭玄大统，开皇七年（587）又命昙迁为昭玄大沙门统。至于地方僧官则有统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等的设置。僧官制度的完善有利于僧团组织的发展。

在建寺、造像的同时，隋文帝十分注重佛教义学，广集高僧大德于京师诸寺。开皇七年，召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修、济阳宝镇、汲郡洪遵、太原昙迁入关，随从六位大德法师入关的义学僧人有数十人。此后，根据佛教不同门众学派设立“五众主”、“二十五众主”等。五众分别是指涅槃众、地论众、大论众、讲律众、禅门众。据《续高僧传》等记载，法总、童真、善胄等为涅槃众主，慧迁、灵璨为地论众主，法彦、宝袭等为大论众主，洪遵为讲律众主，法应为禅门众主。为晋王所尊的嘉祥大师吉藏，其后也进入京师。众多高僧大德云聚京师，领众研习经论，坐禅修行。此时讲筵法会频繁开启，各方大德相互切磋，有力促进佛教义学的发展。隋炀帝即位后，继续推行文帝在位期间的政策，佛教文化事业不断取得进展。

隋代是中国佛教宗派形成时期。佛教宗派是在南北朝“师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着前后一贯的学说体系以及保证法脉延续的修行传承（师承）方

3 据《广弘明集》卷十九记载，隋文帝杨坚年少时受比丘尼智仙的养育，这一特殊的人生经历，应是其佛教信仰形成的重要原因。

4 关于隋代佛教，参见杜继文：《佛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0—237页。



图18-1-1 昙延法师故事，甘肃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南壁，初唐，壁画

式。天台宗、三论宗渊源于北朝，创立于隋朝。智顗（智者大师）、吉藏（嘉祥大师）分别是创立两个宗派的核心人物。佛教宗派的活跃是隋唐佛教的重要特征之一，对佛教图像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隋代官方译经事业在隋文帝、炀帝支持下开展起来。京师大兴善寺、洛阳上林园成为官方译经道场。昭玄统昙迁等三十余人主持的大兴善寺译经道场，先后迎请域外僧人那连提黎耶舍、阇那崛多译经。隋炀帝于洛阳上林园设翻经馆，南印度的达摩笈多主持译经。参与译经事业的还有沙门彦琮、明穆等人。其中阇那崛多译经30余部，包括多部密教经典，如《不空罽索观世音心咒》一卷、《十二佛名神咒除障灭罪经》一卷、《大法炬陀罗尼经》二十卷、《大威德陀罗尼经》二十卷等。达摩笈多译出9部佛经，包括《药师如来本愿经》、《千转陀罗尼神咒经》等。隋代密教经典的翻译与传播，预示着唐代密教盛况即将到来。

隋代帝王与本土高僧交往频繁，其中莫高窟初唐323窟南壁的一铺壁画（图18-1-1），生动表现了隋文帝与昙延法师之间的故事。昙延是北周、隋代最著名的高僧之一。画面上部居中描绘了一座放射五彩光芒的宝塔，旁边有二人同时伸手指向佛塔，从身体姿势来看，他们显然为眼前发生的奇异场景所震撼，正在呼喊交流。画面表现的是昙延法师在北周时撰写《涅槃疏》的故事。据《续高僧传》中《昙延传》记载，法师将《涅槃经》与《涅槃疏》置于仁寿寺舍利

塔前，经书放光，通夜呈祥，塔中舍利也放神光，三日三夜，辉耀不绝。境内人士纷纷前来瞻礼。画面的醒目位置表现此事，为其后隋文帝尊崇昙延法师及礼请祈雨情节埋下伏笔。

隋文帝即位之初，采纳昙延建议，度僧千人，由此开启隋代复兴佛教运动。开皇四年，文帝下敕昙延所在寺院名为“延兴寺”，与此同时，京城东西二门，也取延名为“延兴门”、“延平门”。对一位高僧如此礼遇，确实非同寻常。开皇六年发生的大旱灾情令朝野不安。隋文帝先是迎请三百僧人祈雨，没有感应。其后，在昙延建议下，文帝亲自参与受八关斋戒及祈雨活动，“请延于大兴殿登御座南面授法。帝及朝宰五品以上，咸席地北面而受八戒”⁵。授戒后至日中正午，就感得遍降雨水。第323窟壁画左上方，表现的正是隋文帝与群臣席地受戒一幕，由合十仰视的神情可见文帝的虔诚、谦恭。

隋代时，南、北佛教进一步融合，为唐代佛教的兴隆奠定了坚实基础。

唐代佛教处于中国佛教史的鼎盛期，其间高僧林立，宗派繁盛，寺院经济基础坚实，信众数量庞大。唐代佛教创造出丰富、深刻的理论体系，代表着此期哲学思想的最高水平，受到大批士人的青睐。唐代及其以后的儒、道二教思想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唐代时，以密宗为主的高僧不仅通达佛学理论，而且具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妙用，他们得到皇室贵族高度尊崇。佛教在唐代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⁶。

唐代初期，佛教在民间的影响不断扩大，但没有获得高祖的全力支持。太宗即位前期，对佛教有意抑制，到了后期，对佛教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贞观十五年（641），太宗亲临弘福寺，为太穆皇后举办斋会追福，自称为菩萨戒弟子。贞观十九年，玄奘从印度取经载誉归来，受到太宗隆重礼遇。其后，在太宗支持下，译经弘法事业得以充分开展。太宗晚年对佛教信仰明显增强，曾因宿疾见好，下诏令京城及诸州寺院各度僧5名，弘福寺度僧50人，全国总计度僧18000余人，成为初唐最大的一次度僧活动。以玄奘、窥基为代表的法相宗，即创立于太宗在位期间。初唐时，在道绰、善导倡导下，西方净土法门由观想念佛发展出持名念佛，由于简便易行，在民间广泛传播开来。

唐高宗即位后，继续支持玄奘译经事业。显庆（656—661）以后，因身体不佳，朝政要事皆由皇后武则天决策。武则天除了政治需要外，也因个人信仰，特别推崇佛教。她有意抑制李唐帝室推崇的道教。690年，武则天即位以后，不遗余力支持佛教建寺、造像、译经等事业，佛教呈现日益兴隆的局

5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义解篇》，《大正藏》第50册，第489页。

6 关于唐代佛教，参见杜继文：《佛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8—281页；参见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图18-1-2 佛骨舍利，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

面。高宗即位以后，新的宗派陆续产生。道宣律师主要活动于太宗、高宗在位期间，十分注重《四分律》的弘扬，为律宗南山系创始人，后来被尊为律宗祖师。佛教修行的核心是“戒、定、慧”三学，持戒为基础。唐代佛教的兴盛，律宗僧人起到重要的作用。武周时期，在武则天的推动下，以法藏为首的僧侣创立的华严宗大兴于世，与此同时，以神秀等为代表的禅宗（北宗）在长安、洛阳一带产生极大的影响。

唐玄宗崇信道教，即位之初多方面限制佛教发展。由于佛教的社会根基已很坚实，诸多宗派不断发展，玄宗的政策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开元二十四年，玄宗为《金刚经》作注，颁布天下，显然出于三教并重的政策需要。开元年间，中天竺的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69—741）及师子国的不空（705—774）先后入唐，受到玄宗的信任与支持，他们在长安、洛阳翻译密教经典，灌顶传法，被誉为“开元三大士”。唐代著名的一行禅师先后从善无畏、金刚智处接受灌顶，获得胎藏界、金刚界密法传承，并协助他们译出两界密法的根本经典。在一行禅师的鼎力支持下，唐代密宗得以创立，进而对盛唐以后的中国佛教产生深远影响。一行所撰的《大日经疏》是唐代密宗的重要著作。密宗提倡的护国佑民思想，深受玄宗及其后肃宗、代宗的认同。

唐肃宗、代宗在位期间，以不空为代表的密宗僧人，受到皇室贵族高度的尊崇。翻译佛经等成为国家兴办的祈福事业。不空重译《仁王护国经》后，撰写《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陀罗尼念诵仪轨》、《仁王般若念诵法》等，令密宗弟子依法修持，均与护国祈福目的有关。中唐时期，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道场的信仰进一步普及开来。在此期间，华严宗的澄观法师等发挥了一定作用，而不空大师等密宗僧人所起作用更为明显。大历七年（772），经不空奏请，大兴善寺及天下寺院获准增建文殊阁，供奉文殊像，并长时讲诵《文殊佛刹功德经》等，文殊信仰由此从五台山传播到全国各地。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敕从法门寺迎请佛骨舍利至京城供养（图18-1-2），先在宫内供养三天，然后送城内诸寺供信众瞻礼，这一佛事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后，穆宗、敬宗、文宗继续提倡佛教。随着僧尼人数不断上升，寺院经济规模扩大，一定程度削弱了国家经济实力，由此成为唐武宗灭法的诱因之一。武宗喜好道教修摄之事，开成末年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内，亲受法箓。会昌二年至五年，武宗发起大规模毁灭佛教运动。其间，天下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佛教遭遇重大挫折，由盛而衰。武宗灭佛后不久，离开人世。宣宗即位后随即下诏恢复佛事，并诛杀怂恿武宗灭法的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

唐懿宗、僖宗在位期间，佛教得到朝廷较大的支持。咸通十四年（873），懿宗敕从法门寺迎请舍利供养。此次活动规模隆重，时间较长。从法门寺出土的